

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今天,各国都为自己制定了未来的经济合作蓝图,以此为基础分阶段、分步骤实施计划。由于各国之间计划目标的差别,使他们往往表现出相互矛盾的经济及对外政策。因为大国与小国、穷国与富国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永远是有明显差别甚至是对立的。在某些情形下,获取的利益必须以牺牲自己或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一方获利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因此各国要计算自己将受到多大损失。谁受益大,谁将受到损害?在东北亚地区,各国在发展经济合作的目标、方式等方面也相去甚远。

日本在不得对其拓展亚太经济合作及其全球战略有丝毫损害的前提下以文化交流为主,经济合作为辅——资源与市场,同时不能对环境带来新的污染(日本对俄罗斯向日本海倾倒核废料始终耿耿于怀)。中国则基于发展内陆边疆经济,有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自然以经济利益为先,吉林、黑龙江两省希望打通自己的出海口,以利于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交流;韩国在取得资源与市场的同时还要顾全半岛统一大业;俄罗斯多为地方政府行为,在开发本地资源的同时必须注意生态环境问题,还时刻警惕不能把本地区变成外国的经济殖民地;蒙古和朝鲜都希望藉此引进外国的资本、技术等,却不愿承担相应的义务。

因此,从东北亚地区对发展域内经济合作的积极态度看,各国家和地区排序大致为:中国吉林省与黑龙江省、蒙古、朝鲜——韩国、俄罗斯远东——日本西部地方自治体——中、俄、日中央政府。最积极的都是落后国家或地区。

三、对策

东北亚地区域内外经济合作所存在的巨大利益差别是导致本地区经济合作停滞不前的主要障碍之一,它使一些国家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斤斤计较,权衡比较。基于其产生根源的客观性和复杂性,无论采取什么对策都无法改变这一现实,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因此一味片面追求制度性的经济合作形式显然是不现实的。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把精力置于发展双边贸易和投资合作上。□

(责任编辑:陆福英)

社会选择,福利和贫困

——森的学术思想综述

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 □林新

阿马蒂亚·森是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33年他出生于孟加拉,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之后在印度加尔各答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

国哈佛大学任教。1998年,他辞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和哲学教授职位,任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他最主要的贡献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方面,其研究成果突出体现在三篇论著中,即1970年的《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1973年的《论经济不平等》,1981年的《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所发布的公报说,森研究的领域包括社会选择的公理系统,福利的定义,贫困指数以及对饥荒的实证研究;下面我们将大致按双上几个方面阐述森的学术思想。注意到森是一个杰出的数理经济学家,他的论著中充满了严格的数学和逻辑推理,在本文中我们略去了大部分的数学推导,只对他的成果给出定性的描述,有兴趣的学者可以从文本的参考目录中找出资料做进一步的研究。

突破阿罗不可能定理

社会选择理论要求寻找某种方式,把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统一成集体决策,这种个人观念和集体决策之间的关系构成社会选择的基本前提。社会总体的偏好能否从社会成员的偏好中推导出来?如果能,那又应该如何推导?这个问题关系着是否可以评价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而形成有关的社会福利政策。

少数服从多数是集体决策中最常用的一个原则。但很久以前,人们就发现它严重无效率,并且可能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犯。在一些情况下人们所投的票并不是他们最喜欢的选择,或者会产生人为操纵投票程序以改变投票结果。在投票时有时无法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比如对a, b, c进行两两选择,在a, b选择中多数人选a;在b, c选择中,多数人选b;而同时在a: c的选择中多数人选c。由于这种社会偏好的不可传递性,按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就无法得到一个明确的最佳选择。森在早期研究中,明确了消除这种不可传递性的一般条件。

50年代初,肯尼斯·阿罗对这些与集体选择有关的问题进行研究,检验了集中个人偏好的可能之后,提出了令人惊奇的阿罗不可能定理。他提出五条公理作为社会选择的合理条件:(1)普遍性,即社会偏好适用于所有的个人偏好;(2)单调性,如果每个社会

个体偏好a而不偏好b,则整个社会偏好a而不偏好b;(3)彼此不相干的选择对象具有独立性;(4)社会选择序列不应是强加的;(5)社会选择的安排应该是非独裁的,阿罗从数学上给出了严格的证明,认为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社会选择规则是不存在的,少数服从多数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规则而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阿罗定理成了福利经济学研究中不可跨越的阻碍。在阿罗定理的条件下,个人偏好的集中是不可能的,不同社会形态的评价是不可能的,甚至有人由此得出福利经济学趋于消亡的结论。森从6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成果消除了这种悲观的气氛,开创了福利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森从两方面打开了僵局,一是引入不同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效用补偿及公平性;一是引入非效用信息,将自由,权力等条件置于社会选择理论中。

森对传统福利经济学中“一致同意”的概念,特别是假设个人可以有不同选择,但却没有人际间的可比性表示怀疑。森认为,阿罗定理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由以下两者组合导出:一是排除非效用信息的福利概念;一是非常少的效用信息,特别是有意避免人际间的效用比较。这种信息的排除体现在国家政策上,就是扩大了穷人和富人利益的冲突,它使人们不可能优先考虑穷人的利益。因为按照这种不可比性,无论是根据效用,还是根据收入或者其它非效用信息,都无法为优先考虑穷人利益而把它们与富人的利益相区别。森批评说:“当所使用的效用信息很少时,这种福利主义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即使有很多的效用信息,它也带来很大的局限性,这只要考虑一下自由,歧视,剥削或者社会安全权利等问题就可以明确得到结论。传统的思想只在非效用信息可以决定或替代效用信息的时候才想到使用它,否则就弃之不顾。”

个人权利和社会选择

森把阿罗定理,帕累托主义和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都归入传统福利价值观念而加以批判。要打破阿罗定理所造成的僵局,就必须超越原有的福利观念,森从“个人权利”的角度阐发他的新观念。森指出,集体决策规则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独

裁性,它不应该反映某个单个人的价值观念,一个人的个人选择,比如睡眠习惯或阅读书籍的选择,纯属个人之事,不应该用别人的习惯来要求他也作出同样的选择。人们拥有各种确定的权利,这是任何社会福利函数都应该尊重和考虑的。因此个人自由应该代替原来的福利观念而成为评价一个良好社会状态的基础。而个人自由的评价需要个人偏好的信息作基础,这样就离不开非效用信息。森暗示说,为了评价社会福利,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人的效用是来自吃香蕉,还是来自对别人的损害,这个论证破坏了帕累托标准,因为帕累托标准是排除效用信息的。森下结论说,如果我们接受人们拥有一定权利的说法,那么非效用信息就不能被排除,个人偏好必须在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中起更大的作用。

此外,森还指出社会选择这个大问题下包含着许多不同类型的具体操作,他列举了许多社会选择问题,比如:制定竞选规则;为一个国家制定宪法;判定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为公众利益服务;选择评价财政政策的方式;在公众利益基础上作出中央计划;作出系统的社会福利判定,建立国家贫困或不平等的评价指标体系等等。这些具体操作都与信息的排列方式有关,但是信息的性质将随着所需要的评价和解决方式的改变而改变。道德考虑和实用考虑的平衡也会因不同操作的性质而改变,这些性质决定了哪一种社会选择形式才是合适的。同时,不同性质的问题还影响内部公理系统的选择,应该使用哪一种类型的人际比较,或者应该考虑哪一些信息的约束。

福利评价指标和贫困指数

为了比较不同国家的福利分配,或是一个特定国家分配状况的变化,必须有一些测定福利或收入差距的指标,构造这些指标是社会选择理论的一个重要应用。从这一点来说,不平等指数与代表社会价值观念的社会福利函数紧密相连。最早在这一领域取得重大成果的有 Sarge Klom, Anthong Atkiason 等人。1970 年左右,他们弄清了描述收入分配的洛伦兹曲线,描述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和不同收入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的关系。森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社会福利评价中,森提出了所谓的“能力方式”。他特别注意到,确切的说不是商品创造了福利而是形成对商品需求的活动创造了福利,按照这种观点,收入创造了“能力”,所以收入是重要的,但这种能力还依赖于健康之类的许多其它因素,所以测量福利时应该考虑这些因素。森指出,所有构造完善的伦理准则都预先假定人在某方面是平等的,但人与人之间利用平等机会的能力是不同的,所以分配问题不可能被完全解决,在某些方面平等只能意味着在另一方面不平等。在哪些方面我们提倡平等,在哪些方面我仍接受不平等,这依赖于我们如何评价福利的不同方面。森坚持认为,个人能力构成我们追求平等的主要方面。我们可以清楚地由能力看到个人的优点,因而它对于个人机会和成功的评价特别有说服力。森认为,贫困的测量应该看作是根据通行的需要标准估计人们困境的一种描述过程。更基本地说,它是一种事实操作而不是伦理操作。通常测量一个社会的贫困程度的指标是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 H ,但这种测量的理论基础受到怀疑,它忽视了穷人的贫困程度,即使社会中最穷的人的收入有了显著的变化,但如果他们的收入仍低于贫困线, H 就保持不变。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森设计了贫困指数 P , $P = H [1 + (1 - I) * G]$, G 指基尼系数, I 大于 0 小于 1, 是收入分配的测算结果。根据森对福利和个人信息的分析,他明确指出这一指数使用的合理性,例如,在一些贫穷的国家,由于统计工作的落后,所得的数据常常是有问题的,但仍然可以进行比较,这样贫困指数就可以得到应用。在其他国家,森的贫困指数也得到广泛应用,对于通常使用的福利指标,如人均国民收入,森指出它只考虑平均条件的缺陷,并对它作了改进,使之包含收入分配。他提出一个特别的指标是 $y^* (1 - G)$, y 是人均国民收入, G 是基尼系数,从森提出的福利公理系统和能力方式中,人们还构造了其他的福利指标,如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

权利与饥荒

森在发展经济学也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他认为,经济发展必须包含人们生存能力的扩大,而传统

发展经济学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仅仅分析经济增长将造成很大的缺陷,必须加入收入分配的信息来说明人们能力的提高。森指出权利和能力的紧密联系,一个人能得到多少商品这种权利反映了人的能力。森定义了“权利交换”和“绝对剥夺”的概念,以此将法律、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量引入贫困和饥荒的分析,森说:“为了理解普通性贫困,或者经常性饥饿,或者饥荒的爆发,必须看到所有权方式和权利交换,以及隐藏在后面的力量。这需要仔细考虑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经济阶级结构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森对1940年以来的几次大饥荒,包括孟加拉大饥荒,埃塞俄比亚饥荒,撒哈拉饥荒作了实证研究。森在研究中驳斥了食物短缺是引起饥荒最主要甚至是唯一原因的观点。例如,他认为1974年孟加拉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是那一年全国的水灾抬高了粮价,而农业工人的就业机会因为农产品没有收成而急剧下降,这些因素导致农业工人实际收入大为下降。这一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受到饥饿最沉重的打击。森分析说:“如果有人饿死了,那当然是他们食物不够,但问题是:为什么他们没有食物?是什么使一个阶层拥有食物而另一个阶层不能?”森认为这种事实无法只用食物短缺来解释,因为有时在食物供应并没有明显低于其它年份的时候发生了饥荒,或者饥荒的地区有时还出口粮食。森的论点是,饥荒是一个穷国经济灾难导致贫困骤增最明显的例子,这种剧增是因为那些易受伤害的人失去了获得食物的权利,而不是食物供给下降起主要作用。森根据人们和食物之间的联系来分析问题,认定饥荒是一种权利的失效。森在这方面的研究更具有政治经济学的意味,他进一步考虑了政治机制中各个集团的信息传导系统对人们权利的影响。他还把印度和中国作了比较,例如,(1)印度在历史上避免饥荒的情况优于中国;(2)印度无法像中国那样有效地治理地方病。森就此提出不同制度的优点能否揉合在一起这一课题。

增长原因时相当成功。但对于经济发展来说,还应该分析人们的生存能力和权利,应该分析社会福利的分配。森曾受国际ILO组织委托,对发展中国家的就业问题进行研究,其成果见于1975年《就业、技术与发展》一文。森认识到,对于就业的定义、测量、存在问题及解决方法,理论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就业是多方面的,企图以单一测度来描述就业是注定要失败的。由于森的研究,ILO越来越倾向于放弃模糊的就业定义转向更为清楚的收入分配问题。

森的另一兴趣是对技术选择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以古典方法写出的《技术的选择》。在后来的研究中,他讨论了生产方式和技术选择的关系,他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明技术选择是如何根据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个模型的参数包括相关决策者产出所占的份额、技术的成本优势、工资率、资金可得性及利率,它们在不同的生产模式中变化。森用这一模型解释了劳动相对密集的家庭农场和雇佣工人的大农场之间使用技术的明显差异。

森的学术研究,横跨福利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两大分支,开创了许多独特的领域。其在对福利分配的一般性研究和对社会最贫困阶层的研究中,特别注意将这些领域紧密相连。森在社会选择公理系统中引入可比较效用信息和非效用信息澄清了什么条件下个人价值观念可以集中到集体决策,什么条件下集体决策规则与个人权利的范围相一致。在此基础上,他给出了对福利的定义,提出用能力方式进行福利的测量;构造了更加令人满意的福利指标和贫困指数,并且对饥荒做出了独到的实证研究,从个人权利被剥夺的角度对贫困和饥荒给出新的解释。可以说,他成功地把经济学和哲学结合在一起,重建了对一些经济伦理问题的探讨和研究。□

(责任编辑:夏铭心)

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

森认为传统发展经济学在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